

龙邱庄文化的北上与大汶口文化的形成*

韩建业

(北京 100083)

摘要:大汶口文化是在北辛文化的基础上,接受江淮地区龙邱庄文化北上的强烈影响而形成,形成后又与江淮、江浙地区文化不断交流,加上仰韶文化同时向两地施加影响,从而使得海岱和江淮、江浙地区的文化面貌越来越近似,逐渐在东部沿海地区形成“鼎豆壶杯鬲(盃)文化系统”。从这个角度看,当年提出“青莲岗文化”自有其合理的一面。

关键词:大汶口文化;龙邱庄文化;青莲岗文化

中图分类号:K87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327(2011)01-0059-06

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山东发现北辛文化后不久,有学者就提出北辛文化为大汶口文化前身的论点^[1]。此论虽长期被视为定论,但仍有继续完善的必要,因为它忽视了江淮地区龙邱庄文化的北上在大汶口文化形成过程中的重要贡献。本文拟重点讨论这一问题,并重新审视关于大汶口文化和青莲岗文化的纠葛。

—

我们首先比较大汶口文化最早阶段和北辛文化最晚阶段遗存。

鲁中南和苏北地区是早期大汶口文化分布的核心所在,在山东泰安大汶口^[2]、兖州王因^[3]、邹城野店^[4]、济宁玉皇顶^[5]和江苏邳州刘林^[6]等遗址都发现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遗存。

《大汶口续集》将大汶口遗址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遗存分为3期,属于一期的至少有15个单位,其中出土和发表陶器较多者有H2003、H2026、M1001、M2004、M2012、M2016等,根据遗物特征还应包括M2021在内。这些单位的开口层位虽有所不同,可由于各探方地层没有严格统一,因此很难依地层关系将其做进一步划分。但我们可以据这些单位出土的平底

和三足的陶深腹杯和觚形杯,将其分成两组:第1组包含深腹杯,以H2003和H2026为代表;第2组包含觚形杯,以M2012、M2004、M2016、M2021为代表。由于该遗址觚形杯存在由矮胖向瘦长发展的总体演变规律,因此推测第2组的M2012:1这类最早的觚形杯,极有可能是从第1组H2003:3这类深腹杯演化而来,或许还经过了M1001:3这样的中间环节。总体的演化趋势是器体趋于瘦长,口部不断扩大,垂腹下移缩变为底边出棱(图一 1~5)。由此推断上述2组单位存在依次早晚的关系。

《山东王因》将灰坑和墓葬都归属于某一层,实际开口层位均未交待清楚,以这样的地层关系划分的组别意义不大。我们主要依据发表陶器的类型学特征,将相当于大汶口遗址一期的单位也分成2组:M2594、M2583、M2102等为第1组,M2490、M2464、M2108等为第2组,这两组的变化规律基本同于大汶口遗址,也应当是依次早晚的关系,M2568所出杯当为两组的过渡形态(图一 6~10)。

此外,野店M6、M53和刘林的M210、M219等相当于大汶口和王因遗址的第2组。

如果从文化的因素结构着眼,上述大汶口文化一期第1组陶器可分为两类:甲类包括釜

收稿日期:2010-1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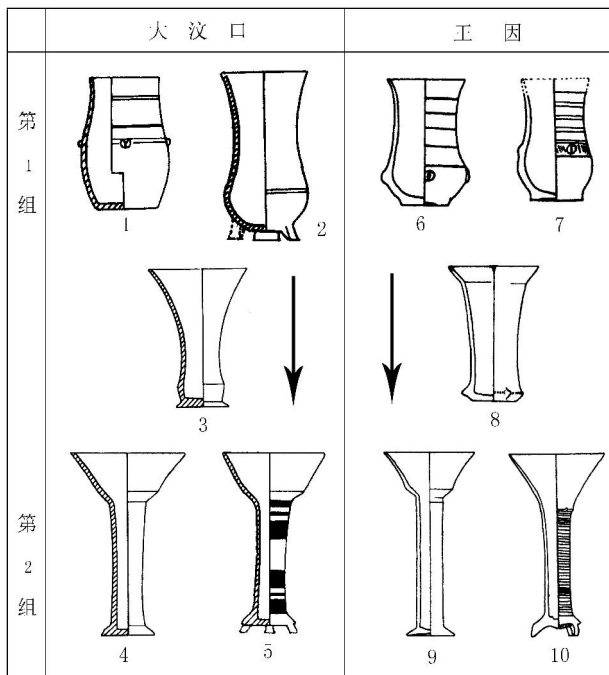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韩建业(1967-),男,甘肃通渭人,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历史系教授。

形鼎、盆形鼎、小平底钵、小口矮颈球腹壶等,乙类包括深腹杯、觚形杯、扁足罐形鼎、宽扁足三足钵等。比较来看,占据主体的甲类陶器同以大汶口 H31、H2 和王因 T426 下为代表的北辛文化最晚阶段遗存一脉相承,表明大汶口文化的确以北辛文化为主体发展而来,但颇具特色的乙类陶器在北辛文化中却毫无渊源可寻。至大汶口文化一期第 2 组,又新出单把釜形鼎、单把盃、高柄豆、矮柄豆等陶器,也和北辛文化无关。换句话说,乙类器物的出现实际成为区分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标志,显见大汶口文化的形成还有乙类器物所代表的文化系统的重要贡献在内。

二

让我们将眼光转到江淮东部地区的龙邱庄遗址^[7]。发掘者将该遗址龙邱庄文化居址遗存分为 3 期,其中遗址主体第 8 层和第 7 层属第一期,第 6~4 层及其下开口的灰坑属第二期。这两期地层关系较为清楚,包含陶器存在一定的演变关系,其分期结论大致可信。该遗址还发现 402 座墓葬,除 3 座外其余都由于辨认困难而未发掘出墓坑,因此开口层位不清楚。发掘者指出,墓葬区与居住区的地层堆积完全可以彼此对应,“墓地中的地层是由于墓葬的堆积叠压而形成的,而不是形成地层之后再挖开埋入死者的”^[8],因此,可以将所有墓葬分为“第 6 层墓葬”、“第 5 层墓葬”和“第 4 层墓葬”,而且其中“第 6 层墓葬”属于第二期前段,“第 5 层墓葬”和“第 4 层墓葬”属于第二期晚段。从随葬陶器来看, M214、M274、M156、M401 为代表的“第 6 层墓葬”陶器类型学特征相近,确可归属第二期前段,说明这个分期方案基本成立。

比较发现,大汶口文化一期第 1、2 组新出的乙类陶器,正好分别是龙邱庄遗址第一期和第二期前段的典型陶器,表明他们的年代分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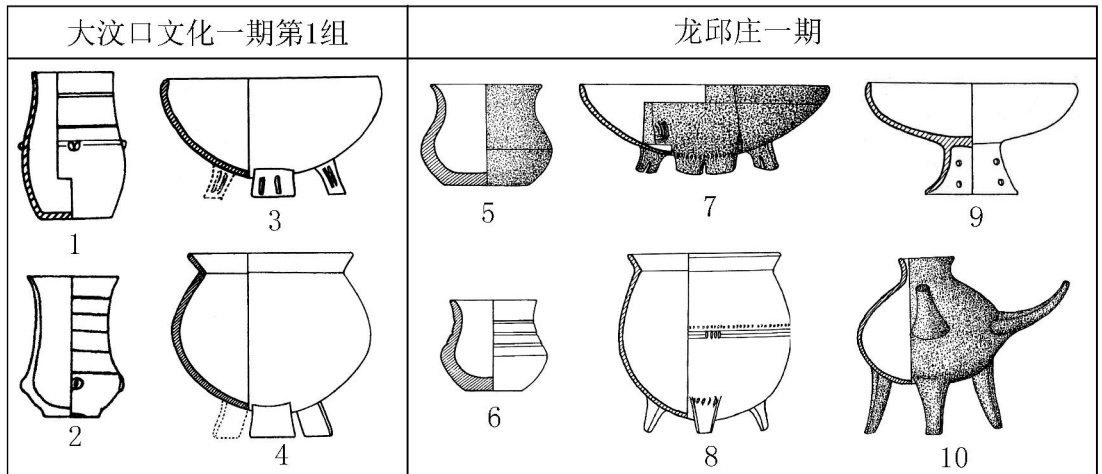


图一 大汶口文化一期陶深腹杯向觚形杯的演化

1~5.大汶口(H2003:24、H2003:3、M1001:3、M2012:1、M2012:6) 6、7.王因 M2594 8.王因 M2568 9、10.王因 M21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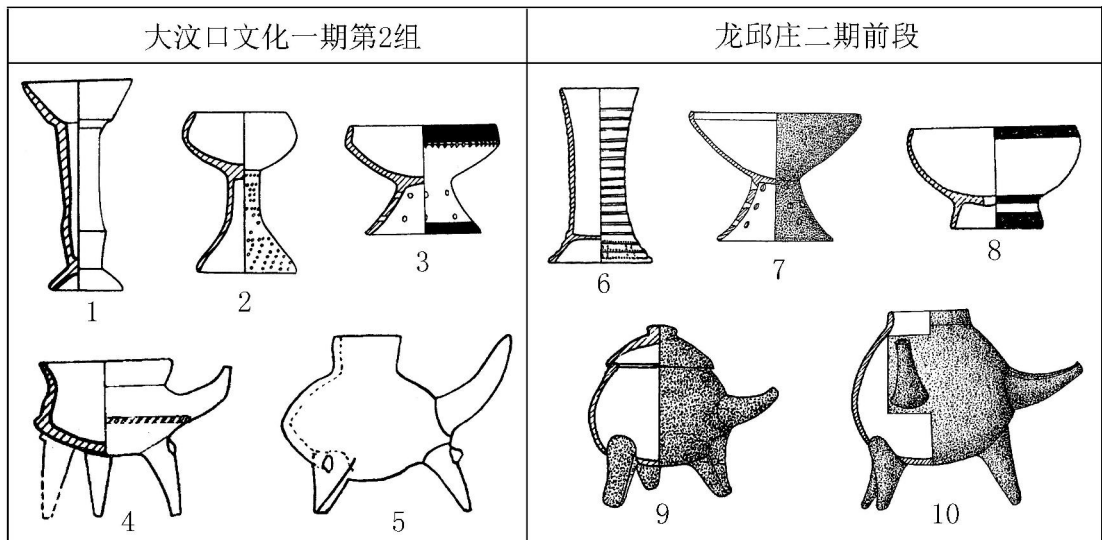
接近,且相互有密切关系。具体来说,大汶口文化一期第 1 组的深腹杯、扁足罐形鼎和带沟槽宽扁足三足钵等和龙邱庄遗址第一期同类器形态都十分接近,只是前者深腹杯已经向瘦长方向发展(图二)。大汶口文化一期第 2 组的圈足觚形杯、单把鼎、单把盃、镂空高柄豆、矮柄豆等,则和龙邱庄遗址第二期前段器物近似,只是前者单把鼎为釜形,单把盃无管状流,深腹杯更细长且口部明显扩大,而后者单把鼎为罐形,单把盃有管状流,深腹杯较矮胖(图三)。

深腹杯、单把鼎、单把盃、扁足罐形鼎、带沟槽宽扁足三足钵、镂空高柄豆、矮柄豆等陶器,都属龙邱庄文化第一、二期主要器物,且发展演变轨迹清楚,而在大汶口文化中则先后陆续出现,且处于次要地位。有理由推测大汶口文化中这类因素的出现当为龙邱庄文化北上影响的结果^[9]。按照已经测定的碳十四数据,龙邱庄一期约为公元前 4600~前 4300 年,二期



图二 大汶口文化一期第1组和龙邱庄一期陶器比较

1、2、5、6.深腹杯(大汶口 H2003:24、王因 M2594、龙邱庄 T1726 :16、T1627 :8) 3、7.扁足三足钵(大汶口 H2003:2、龙邱庄 T1526 :4) 4、8.扁足鼎(大汶口 H2026:8、龙邱庄 T1629 :7) 9.豆(龙邱庄 T3729 :12) 10.单把盃(龙邱庄 T1827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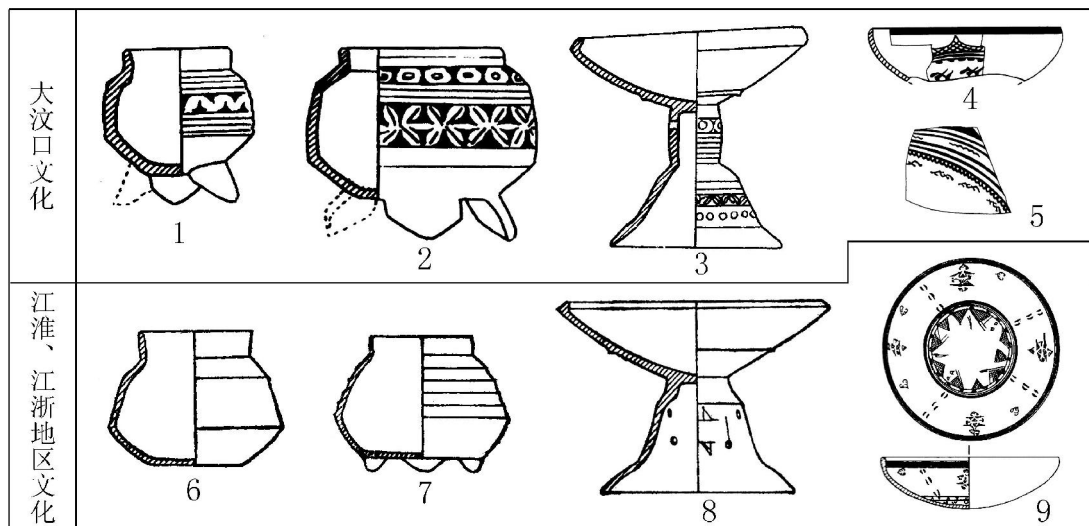
图三 大汶口文化一期第2组和龙邱庄二期前段陶器比较

1、6.觚形杯(大汶口 M2004:2、龙邱庄 M156:2) 2、3、7、8.豆(大汶口 M2004:8、M2012:3、龙邱庄 M214:3、M401:1)
4、9.单把鼎(大汶口 M2004:4、龙邱庄 M274:3) 5、10.单把盃(大汶口 M1001:4、龙邱庄 T0929 :4)

前段约为公元前4300~前4000年^[10]，大汶口文化早期约为公元前4100~前3500年，其中最早的一期第1、2组大概在公元前4100~前4000年^[11]。可见大汶口文化一期大致与龙邱庄二期前段同时，上限可与龙邱庄一期衔接。年代数据支持上述推论。

三

从大的文化格局来看，在大汶口文化之前的约公元前4500~前4200年，在山东、苏北分布着晚期北辛文化，周围地区则分别是河北的仰韶文化后岗类型、豫中的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12]、江淮东部附近的龙邱庄文化一期或类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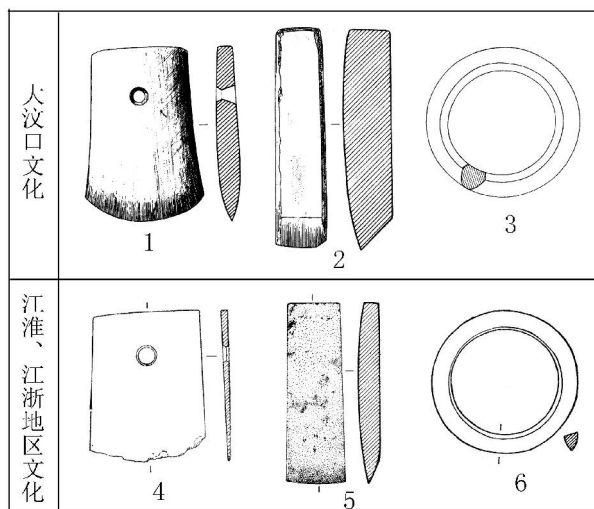
图四 大汶口文化和江淮、江浙地区文化陶器比较(一)

1、2、7.三足折腹罐(大汶口 M2018:18、15、青墩 M14:4) 3、8.豆(大汶口 M1012:5、青墩 M62:1) 4、5、9.彩陶钵(玉皇顶 T2 :5、T2 :8、龙邱庄 M162:9) 6.平底折腹罐(青墩 M41:3)

遗存^[13]。这时北辛文化和仰韶文化后岗类型、大河村类型的交流异常频繁^[14]，并已受到江淮地区些许影响^[15]。从约公元前 4200 年开始，仰韶文化东庄类型崛起于晋南豫西，并迅速向周围大幅度扩张^[16]。稍后约公元前 4100 年江浙、江淮地区文化的“崧泽化”过程^[17]，乃至龙邱庄文化的北上和大汶口文化的形成，应当都与来自仰韶文化核心区的强力激荡影响有关。

约公元前 4000 年之后，在大汶口文化二、三期中仍包含部分江淮、江浙地区的文化因素，比如平底或三足的折腹罐等来自崧泽文化^[18]，饰网纹、波折纹的彩陶钵来自龙邱庄文化^[19]（图四），钺、长体镞、镞等石器和八角形纹、太阳纹等新因素，则早先见于北阴阳营文化、崧泽文化和薛家岗文化^[20]（图五）。其中的八角形纹、太阳纹等因素的更早来源在长江中游的高庙文化^[21]。反过来，大汶口文化的高柄杯^[22]、口沿外饰多周旋纹的直腹缸等典型因素，同时传播至江浙、江淮地区的龙邱庄文化、北阴阳营文化、薛家岗文化、崧泽文化等当中^[23]（图六）；北阴阳营文化所见鼎足根凸起等现象，也可能为受大汶口文化影响所致。可见此时海岱与江淮、江浙地区的文化关系已经转变为双向互动。此外，来自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阎村类型的花瓣纹彩陶、陶敛口鼓肩深腹钵、陶宽折沿盆、二次葬等因素则急剧增多，体现中原影响的继续加强。实际上大汶口遗址的三足折腹罐装饰花瓣纹，实为崧泽文化和仰韶文化因素的融合体（图四 2）。

大汶口文化的形成与江淮地区龙



图五 大汶口文化和江淮、江浙地区文化石器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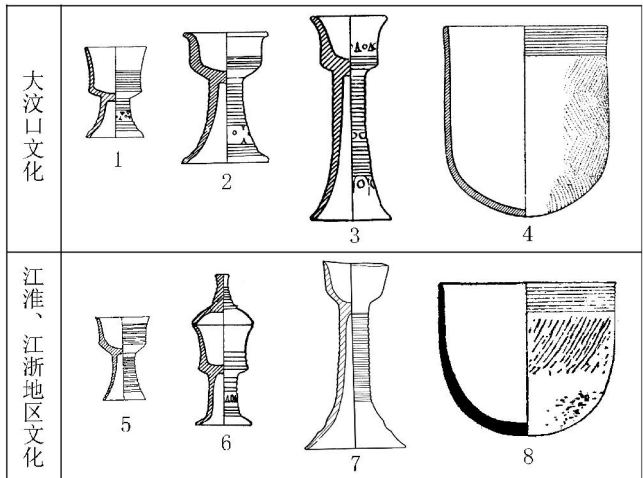
1、4.钺(大汶口 M2008:6、北阴阳营 M286:7) 2、5.镞(大汶口 M1014:24、北阴阳营 M180:4) 3、6.镞(大汶口 M2018:13、崧泽 M92:6)

邱庄文化的北上有关,形成后又与江淮、江浙地区文化不断交流,加上仰韶文化同时向两地施加影响,从而使得海岱和江淮、江浙地区的文化面貌越来越近似,逐渐在东部沿海地区形成“鼎豆壶杯鬶(盃)文化系统”。这个南北纵向的文化系统,与东西横向的黄河流域文化系统和长江中下游文化系统互相贯穿,使得公元前4000年前后的黄河长江流域文化连结为一个相对的文化统一体,构成文化上“早期中国”的主体。

四

最后让我们回顾一下大汶口文化和“青莲岗文化”的纠葛。这两个文化都发现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二者的关系在80年代前曾有过热烈讨论^[24]。代表性意见主要有两种:一是认为淮河故道南北两侧均属于一个文化系统即“青莲岗文化”,根据区域性差异又可以分为“江北类型”和“江南类型”^[25];二是认为淮南北分属两个文化系统,其中山东和苏北遗存为大汶口文化^[26]或者偏早阶段称“青莲岗文化”,偏晚阶段称大汶口文化^[27]。讨论的结果是第二种意见被更多人所接受,“青莲岗文化”一词渐被淡忘。

青莲岗遗址至今仅进行过几次调查,下层所见陶器有鼎、釜、豆、杯、平底盃形器、钵、盘等,还有和龙邱庄二期基本相同的相对重弧纹、以方形为核心的编织纹彩陶^[28]。当年的调查者从中看到了“江南”“江北”的共性因素,并提出“青莲岗文化”的命名,若放在“鼎豆壶杯鬶(盃)文化系统”的角度来看,很有其合理的一面。随着资料的增多,后来的研究者把山东和苏北与其大体同时的遗存称为大汶口文化,把江淮东部与青莲岗下层类似的遗存称为龙邱庄文化,这种做法固然更加可取,但不能因此而忽视了海岱和江淮、江浙文化的密切关系,更不应忘却当年“青莲岗文化”提出者在认



图六 大汶口文化和江淮、江浙地区文化陶器比较(二)

1~3、5~7.高柄杯(大汶口 M2020:27、M2018:42、M1014:6、龙邱庄 T3629 :2、青墩 M44:19、凌家滩 87M9:42) 4、8.缸(刘林 M192:1、崧泽 61T2:31)

识中国东部地区文化共性方面的贡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北京市属高等学校人才强教计划资助项目。

注释:

[1]伍人《山东地区史前文化发展序列及相关问题》,《文物》1982年第10期,第44~54页;吴汝祚《试论北辛文化——兼论大汶口文化的渊源》,《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6年,第196~210页。

[2]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汶口续集——大汶口遗址第二、三次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7年。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王因——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年。

[4]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邹县野店》,文物出版社,1985年。

[5]济宁市文物考古研究室、济宁市任城区文物管理所《山东济宁市玉皇顶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5年第4期,第3~11页;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济宁玉皇顶遗址发掘报告》,《海岱考古》(第三辑),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113页。

[6]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2期,第9~47页。

[7]龙邱庄遗址考古队《龙邱庄——江淮东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9年。

[8]龙邱庄遗址考古队《龙邱庄——江淮东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8页。

[9]牟永抗早在80年代末就指出:“在大汶口文化出现陶鬶之前,长江下游的广大地区,已经存在着功能和形态上与陶鬶相近的‘侧把盃’与‘鬶形器’了,他们的最早形态产生在太湖地区的马家浜文化,大汶口文化中陶鬶的出现,可能和他们有关”。龙邱庄文化的陶盃当与马家浜文化属同一系统。见牟永抗《论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

关系》《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1989) 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46~56页。

[10]龙邱庄遗址考古队《龙邱庄——江淮东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95页。

[11]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汶口续集——大汶口遗址第二、三次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7年。

[12]以大河村前二期遗存为代表。见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河村》科学出版社,2001年。

[13]比如高淳薛城早期、江苏金坛三星村一期遗存等。见南京市文物局、南京市博物馆、高淳县文管所《江苏高淳薛城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第5期,第1~20页;江苏省三星村联合考古队《江苏金坛三星村新石器时代遗址》《文物》2004年第2期,第4~26页。

[14]张忠培、乔梁《后岗一期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第3期,第261~280页。

[15]在江苏邳州大墩子北辛文化晚期遗存中见有龙邱庄文化特有的成组弧线纹彩陶。见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四户镇大墩子遗址探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图七-6,第9~56页。

[16]韩建业《涿鹿之战探索》《中原文物》2002年第4期,第20~27页。

[17]公元前4100年前后,在马家浜文化向崧泽文化转变的同时,还出现北阴阳营文化、薛家岗文化、龙邱庄文化二期等与崧泽文化大同小异的遗存,本文暂称这些类似遗存的形成过程为“崧泽化”。这些遗存普遍新出小口鼓腹鼎,有的肩部还饰多周旋纹,当为受到以大河村一期为代表的折腹釜形鼎的影响所致。

[18]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崧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7年;南京博物院《江苏海安青墩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第147~189页。

[19]何德亮等指出大汶口文化早期陶器曾受到龙邱庄文化、崧泽文化的影响。见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20世纪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79

页。

[20]张弛曾指出大汶口文化早期的玉石器制作技术主要来自北阴阳营-薛家岗系统。见张弛《大溪、北阴阳营和薛家岗的石、玉器工业》《考古学研究》(四)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55~76页。

[21]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黔阳高庙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4期,第4~23页;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洪江市高庙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06年第7期,第9~15页。

[22]大汶口文化的高柄杯器体细且周身饰多周旋纹,有些类似于倒置的觚形杯。

[23]南京博物院《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期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3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潜山薛家岗》文物出版社,2004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2006年。

[24]这在1977年召开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学术讨论会”上有集中体现。见《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学术讨论会纪要》《文物》1978年第3期,第35~39页。

[25]吴山菁《略论青莲岗文化》《文物》1973年第6期,第45~61页;南京博物院《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若干问题的探析》《文物》1978年第4期,第46~57页。

[26]安志敏《略论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问题》,《考古》1972年第6期,第35~44页;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1977年第4期,第217~232页;山东省博物馆《谈谈大汶口文化》《文物》1978年第4期,第58~66页;高广仁《试论大汶口文化的分期》《文物集刊》1,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47~65页。

[27]严文明《论青莲岗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关系》,《文物集刊》1,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16~124页。

[28]华东文物工作队《淮安县青莲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报告》《考古学报》第九册,1955年,第13~23页。

Northward Expanding of the Longqiuzhuang Culture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Dawenkou Culture

Han Jianye

(Beijing 100083)

Abstract: The Dawenkou Culture is formed on the basis of the Beixin Culture and meanwhile deeply affected by the northward expanding Longqiuzhuang Culture in the Jianghuai area. After its formation, it continued to interact intercommunicated with cultures in the Jianghuai and Jiangzhe areas, which were influenced by the Yangshao Culture. Thus cultures in the Haidai area became fairly similar to the cultures in the Jianghuai and Jiangzhe areas, in terms forming formed a cultural system that produced pottery ware types such as Ding-tripod, Dou (stemmed dish), jar, cup and Gui (or He, wine vessel).

From the view of this point, previous definitions of the "Qinglian'gang Culture" is approved to be relevant.

Keywords: Dawenkou Culture, Longqiuzhuang Culture, Qinglian'gang Culture

(责任编辑、校对:陈丽新)